

■新作聚焦 徐剑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

天晓之际的建党诗篇

□胡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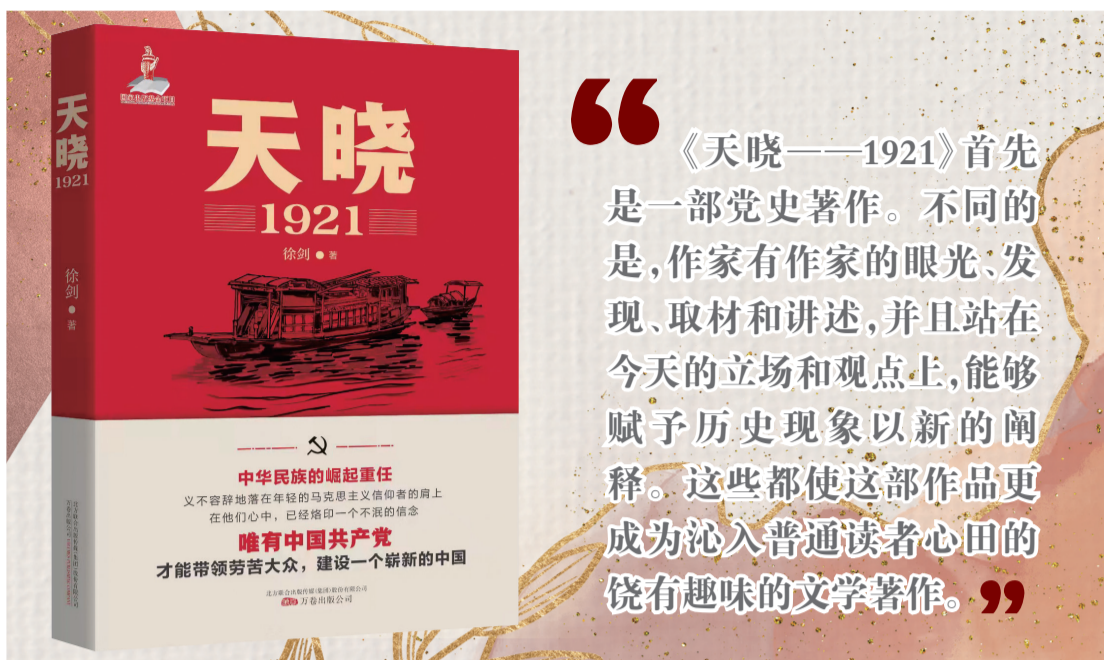
于举国上下纪念建党百年之际,万卷出版公司隆重推出作家徐剑的新著《天晓——1921》。这是一部全面详尽叙述中国共产党孕育与创立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材料扎实,场景丰富,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价值显著。

《天晓——1921》首先是一部党史著作。以往,曾有不少专家对这段历史做出考证和研究,此作也是建立在过去党史学积累的基础上的。不同的是,作家有作家的眼光、发现、取材和讲述,并且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观点上,能够赋予历史现象以新的阐释。这些都使这部作品更成为沁入普通读者心田的饶有趣味的文学著作。当然,作者的创作也获得了历史学家的肯定和赞许。

从书中脚注可以看出,作者为完成这部作品投入了大量精力查阅相关资料。其中,许多文献和文章过去是零星和分散的,有些是相互抵牾的,经过作者的细致考察分辨,使它们在重大主题之下得到融会贯通、去伪存真,形成完整系统,焕发出异样光彩,而作者的若干实地亲身采访,更为重现历史原貌与真相打开了幽深之门。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最重要起点。关于党的诞生的历史追述,过去多聚焦于“一大”,而在“一大”之前,多地已成立共产党支部;在成立各支部前,已经历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与宣传。这一次,《天晓——1921》对建党阶段的描绘是首先从拂晓天边现出的第一道光线开始,较为着力地写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整个“孕育”过程,其中,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成为酝酿建党的重心地带。这些被加强的内容十分重要,为今天人们了解“初心”提供了可信的基础。

对于党的“一大”的召开经过和所有“一大”代表经历的回顾,是全作的主要内容。由于时隔百年,一些存疑事实仍需反复澄清。徐剑善于抓住历史上留下的悬念,娓娓铺写,使作品充满阅读张力。如在参加“一大”的代表究竟为12人还是13人的问题上,书里的讲述颇为引人入胜:最初,陈潭秋和董必武都证明与会代表为13人,后李达认为是12人,参会者包惠僧不在其列,苏联提供的档案也记录为12人。但解放后包惠僧写出两篇万言书,陈述自己为正式代表。张国焘同意“12人”说,认为多出一人为何叔衡。日本中共党史研究者石川祐造则推论多出一人为陈公博,真相可谓扑朔迷离。徐剑在众说纷纭中条分缕析,认为包惠僧只是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包惠僧终其一生,“永远是一个局外人”。这不仅是在讲故事,也是在讲述一个波澜壮阔、泥沙俱下的大革命时代,一个新生政党必将经历的大浪淘沙、离合分化的成熟过程,以及一些在社会潮汐时涨时落中需要不断做出人生选择的个体经验。作品对所有出席这次大会的参会者及工作者们都分别做出传记,在党史著述里尚属首例。12名正式代表当时齐聚一堂,达成共识,决定了古老中国的未来。此后,经过长期实际斗争的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实现历史使命,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的诞生。其间,也有些代表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归途。此作以“代表”为线索,也是以“人”为线索,展开了混沌雄奇的世纪画面,发挥出文学的特殊优势,给正在经历着人生的读者们带来许多感慨,令人浮想联翩。



《天晓——1921》首先是一部党史著作。不同的是,作家有作家的眼光、发现、取材和讲述,并且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观点上,能够赋予历史现象以新的阐释。这些都使这部作品更成为沁入普通读者心田的饶有趣味的文学著作。

作者的成熟表达,也表现在他书写每一位1921年参会者时,不会像学术文章那样规划一、从头道来,而是根据各人特色,选取最生动传神的场景进入。如绘写毛泽东是从一份新解密的绝密医疗记录开始,它记录了“一大”代表毛泽东人生的最后19小时,1976年9月8日,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饲管的情况下,毛泽东看文件、看书达11次,加起来2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下午4点37分进行最后一次阅读,次日凌晨溘然离去。只此一节,便将一代伟人绝不同凡响的生命内涵揭示得使人肃然起敬。描写陈公博,是从铁窗里的墨迹写起。陈公博书法好,抗战结束后他被押解回国关进南京监狱,面临死刑之际,典狱长和狱警还不时向他索要“墨宝”。而他面前的案架,竟是陈独秀当年坐牢时伏案留下过字迹的,陈公博曾来此看望过陈独秀。陈公博闻知后仰天一笑,深叹命运对他的捉弄。接下来作者回溯陈公博的一生,尤其是脱党和追随汪精卫投日的经过,最后仍回到案架前,写他终于落墨,写完最后一件条幅,表达出对生活的最后怀念。这种写法可谓别具匠心,既牢牢抓住读者,也使史料中埋藏的意蕴顿时得到显豁的生动。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同样的题材在不同作家的笔下,会展现很不相同的面貌,其中差别不在于素材,而在于作家在素材中看到了什么。

读毕全书,掩卷回想,书中涉及人物虽多,但大都性格突出,面容可辨,真切可信。能做到这一点,自然归因于作者的执着追求。书里陈独秀、毛泽东、李达、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周佛海、王会悟、包惠僧、马林等人形象格外鲜明,与作者的发挥相关。陈独秀和马林两人个性几乎在他们初次相遇时便暴露无遗。作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特立独行,才情狂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却盛气凌人,对刚成立的中共态度轻蔑。马林提出的包括由共产国际为中共工作人员发放薪金等几项条件使陈独秀怒不可遏,断然拒绝,与马林不欢而散。但陈独秀被捕后,马林全力营救,花重金请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找捕保释,打通会审各关节,协助孙中山使陈独秀出狱。此后,两人捐弃前嫌,虽在政见上仍有冲突,却保持了通力合作,这一过程被作者

描述得有声有色。徐剑深信,只有把人物写活,才能使报告文学作品散发本来应有的魅力,此作再次体现了他的理念。

这部作品记叙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当事人和见证人皆已故去多年,而作者的采访量却一点不见减少。徐剑不辞辛劳从北至南,拜谒13位中共一大党代会参加者的故居,追寻他们的点滴生命痕迹。但事实上,能够再由他亲身发现的史实已经有限,甚至于,逝者家乡的面貌也早已不是当年模样,但作者还是在兴致勃勃地走,哪怕只为领略一下当事人生活过的自然环境。这种敬业态度是有些感人的,实践着徐剑为自己定下的“三不写”规矩,即:没有用脚走过的地方不写,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不写,没有亲眼看到的地点不写。不过他并没有白走,以脚为笔,使这部作品处处洋溢着现场的氛围,浮现起逝者的魂灵,带人们回到那个遥远的时代。而且,他去到的有些地方,过去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心。徐剑到达湖北应城刘仁静家乡时,接待他的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董必武,却对同为建党元老的刘仁静一无所知。后徐剑寻到年近八旬的知情者朱木森,朱老紧紧攥住他的手激动地说,他是几十年来采访刘仁静的第二人。在党的“一大”上兼任翻译的刘仁静,曾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后为党做许多工作,又因赞成托派观点与党各奔东西。由于徐剑的采访和调查,我们现在得知,刘仁静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一大”代表,解放后一直居住北京,与同城居住的“一大”最重要见证者王会悟老死未相往来。1987年初被落实施策任国务院参事不久,在街上被一辆公交车偶然撞倒离世。在这个人物身上,分明体现了历史的迷雾与个人命运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为人们完整理解一部百年党史提供了另一种参照。而他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却可能是在八旬高龄时仍剑气丹心,鹤发童颜,每日清晨背一柄剑,到新街口外北师大操场练剑的情景。这情景中蕴含的人生况味,也是徐剑向我们缓慢呈现的。

最后还必须提到,徐剑的此次写作脱离不掉他对党的炽热深情,此种感情毫不虚伪,自然流露于所有行程及笔端,才有了这部力作。文学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创作的成败也首先取决于是否有真情的灌注。

■创作谈

也许是因为当年毛公润之的身影覆盖了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故对中共一大党史的宏大叙事,多少有点耳熟能详。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屏蔽,有些事未能探知历史真相,但是,随着时间巨流奔涌,有些记忆渐次模糊了,有些阅读则清晰如昨。因此,当某一天,有出版方邀我写一部党的“一大”的文学读本时,先是愕然,继而肃然,最后欣然从命。

答应写作此书后,我向出版社提出一个额外之请,读书行走,走访13位会议出席者的诞生地、求学地、战斗地、壮烈地,乃至叛变者的葬身之地,看见别人未曾看到的地方,发觉他人未曾发现的东西,激活未曾觉悟的迷障。

走进书房,找出书架上早已落尘的《我的回忆》,鸭蛋绿的三卷本封面,系“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时间是1980年11月,内部参考书,工本费仅为1.25元。遥想当年,我23岁,在南方导弹基地政治部当干事,忽一日,在组织处的书架上见到此书,作者居然是鼎鼎大名的张国焘。初得此书,90万字,点灯熬油,读了好几个通宵。惊讶之余,也不知出于何故,未将书退还,竟“据”为己有,从基地带到武汉读军校,再带回部队,后调入北京前,丢了很多书,此书却一路带着,40年了,搬了好多次家,一直未扔。再度摩挲此书时,它已被有当代两司马之称的杨奎松先生推荐为党史研究者的必读书。冥冥之中,仿佛都在等一个前尘约定,等待《天晓——1921》这部书。

半年采访,盛夏入荆楚。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十三位“一大”出席者,五位出自湖北,两位来自湖南,占了党代表的半壁江山,可见当时两湖天空群星璀璨,英才列列。第一站应城是刘仁静的老家,住国家电网培训中心,旁边是应城市革命纪念馆。放下行李,便与馆长相谈,竟不知刘仁静为何人。却一个劲地给我讲抗日年代董必武、陈廉在此培训进步青年,进行游击战。末了,推荐了姓朱的政协副主席,董董老人见到我,惊叹,40年了,你是采访刘仁静的第二人。

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其实考古般的田野行走,印证了我的一个创作信条: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东西不写,听不到故事不写,其实写与不写,皆源自一个作家的内心与良知。在潜江市李汉俊、李书城故里,老屋早已坍塌,青蒿掩墙,野草寂寂,只有一块碑文勒石:李汉俊、李书城出生地。问为何不建故居,党史办有关人员告诉我,邻居家为钉子户,不愿让出菜地,征作停车场。我颇为不解,李家大哥书城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房子,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啊。想来令人怅然若失。

在何叔衡老家,面对着那座大宅院,我看到他一度也在那条船上,考秀才、考功名,可是当他意识到无希望和前途时,就毅然与旧世界决裂,此后一生都在赶考。当教书先生时,他是开明绅士,号称宁乡四杰;后又上新学,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润之是同学,一起出湘,参加一大。上世纪30年代初,他又远赴莫斯科留学。初返回上海时,得知其养子、大女婿夏尺冰、党的湘东南特委书记头悬长沙城头,安慰大女儿实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会有牺牲的。撤往苏区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内务部部长,握着党的刀把子,一次次刀下留人,决不错杀一个。而被王明之流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撤销全部职务。长征前,他被排除在名单之外,留下来打游击,活下来的几乎几乎为寡。江西梅坑,一盂花生米,一盂老酒,他与老友林伯渠别,将实山、实嗣姐妹织的毛衣脱下来,赠给林伯渠,说山高路远水寒,请君保重。送战友,上征途,天破晓时,便是生死别离。他的夫人袁少娥在老家守望了一辈子,直到解放,该回来的都回来了,为何丈夫不归?你留之唯愿一愿,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可是何叔衡与瞿秋白一起突围时,被白军枪杀于山阴,遭贼堆寻。我站在何老夫人墓前,纳闷苍天,叔衡老英雄何时能归?还有董老,长征时,爱人也不在长征名单内,痴情的妻子一路相送,跟着队伍走了三天,将到五岭时,夫妻挥泪相别。五岭迢迢,乌蒙磅礴,一对相爱的人从此天上人间。时隔多年后,董老忆及此,吟一首情诗永记,题毕,顿时老泪纵横。

就这样一路走来,从韶山走到独秀峰。第一晚抵达时,天降小雨,翌日风和日丽,晨曦从韶峰浮冉而起。拜谒毛公铜像时,仰望蓝天,那种蓝是哈达般的蔚蓝。极目远山,竟日月同辉,天呈祥瑞。我已经多次来韶山了,那天重游毛泽东纪念馆,再看那件72个补丁的睡衣,瞬间领悟,一件睡袍挡百级风雨,苍生冷暖。随后十天,我从韶山往独秀峰一路走去,至何叔衡之家,至武陵溪周佛海老宅,然后从怀化坐上高铁到重庆,走进江津石墙院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一个并不大的纪念馆,我居然安静地看了三个半小时。那一刻,少年碎影中的陈独秀拼图完成了,陈公才华横溢,特立独行,个性性格注定了命运悲剧。十天后,走到独秀峰,秋雨戛然而止,夕阳苍山,仲甫公并未走远。徜徉独秀园,不由得感叹:安庆人民善待自己的儿子陈独秀,以隆重的规格,厚葬了他。

行至水穷处。采访结束回到北京,刚写了不到一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始起,我伏案五个半月,每天从早晨七点至子夜时分,到4月上旬,免疫力下降,患上带状疱疹,腰缠半边龙,痛了一月之久,各地的亲朋纷纷给我寄药,解我小恙。当31万字《天晓——1921》落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喜极而泣。十天会期之瞬,写尽百年沧桑,追随13位党代表身后踽踽独行,如经历一场炼狱之旅。推开窗子,时春光明媚,百鸟啼鸣,铁栅栏蔷薇花事正盛,生活多么安静美好。远天中,南陈北李与13位“一大”与会者向我走来,青春与梦想、初心与信仰、忠贞与背叛、牺牲与尊严、壮丽与流亡,皆还魂归来,跃然纸上。

“天晓”一词,取之庄子“天地”篇“冥冥之中,独见晓焉”之意,摩挲飘着墨香的新书,想到董必武携夫人1964年清明节回到嘉兴,坐画舫,登上湖心岛,伫立烟雨楼,题下“作始也简,将毕也鉅”。仍为庄子所语。

2020年5月15日发走手稿,一段红色之旅画下句号,令我此生无憾。壮年变法三部曲之第二部落幕,就像打了胜仗凯旋的士兵,交回令牌,等待下一次出征。感谢行走采访中相助的刘克兴、王跃文、纪红建、王丽君、韩生学、向显桃、李银德先生,慷慨以助,提供不少孤本绝版。

■短 评

盲人、瞎马与洞见

——读陈继明《奔马图》 □许 艺

在流量时代,人们对故事的接受早已不再是一板一眼的起承转合,如果小说作者还自戴镣铐,那只能被读者抛弃。《奔马图》通过一匹马、一座桥和几个人物的碎片化相遇,轻巧地呈现了某些被忽视的存在。小说写作要保留什么、丢弃什么,是每一篇小说都需要具体解决的技术问题。这篇不到九千字的小说,生动写出了4个饱满又不失精神深度的人物,还有他们身后的一匹马和一座城。

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在当地人眼中波澜不惊,这不合常理的结论恰恰揭示了当代人最真实的精神状态:被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和无奇不有的网络同时摇撼的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震撼之物保持感受、回应和表现的能力。对于这座大桥而言,是《奔马图》将我堵在了当路,至此我依然不了解它的长度、宽度以及修建的难度,但是,我知道了日后若有机会看见它,我将经历怎样笨拙的震撼。此后当我再谈及它,我的转述和表达才是我和这座桥的真正关系——一种真实,却又被各种叙述忽视的、人与物的关系。可以想见,我的表述必定难逃关于这座大桥已有的表述,但会有我的筛选和整合。这与唐朝人刘长卿对“日暮苍山远”的感受与表达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也不同于陈奂生对宾馆弹簧大土椅的感受。我用网络懒人心态保留着我对桥的无知与陌生(甚至是怀着一种诚恳的敬意),但我清楚,无论这个时长被拉多长,一旦我与它相遇,我那被网络信息倾泻过的脑袋,

还是会驯服地调用已有表述——我所能做的,最多也只能是筛选和整合,甚至鼓动自己的感受去验证、甚至迎合一些表述。

世界留给人的感知和表述空间,就是这么真实地小而逼仄,且程式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奔马图》令我收获到一种警醒:在信息时代,人与世界之关系已今非昔比,我们需要剔除成见,重新审视、界定、表达这种关系。或者说,当下的文学本就应该呈现对这种关系的崭新表达。在这方面,陈继明是警觉的,也是驾轻就熟的,比如他对城市变迁的表述:“此处半年前还是一个小乡村,十几户人家挤在一起,前方海面上是村子的另一半:十几条各种动力的渔船。可是,某一天渔船和房屋突然消失了,海面上只剩下形单影只的大桥,房屋周围,原本种着一些蔬菜水果的若干小空地,现在是杂草和野花的世界,几棵高大的棕榈树之下是恣意生长的花花草草,茂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读到“令人不安的气氛”几个字,我滑行的目光被强行叫亮,我想我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才能继续往下读,不是野生植物本身可能令我感到不安,而是小说家用艺术直觉和小说形式将要告诉我的东西,可能会“令人不安”。尖锐的小说可能将要开始给我凌厉的不安,厚重的小说则可能展开宽阔深人的磐石般不安,让我意外的是,陈继明就此打住,又写了写花草,开始让女人和越野车出现了。“此刻越野车压出的两条车辙还在,老马冲着边缘地带的这一条车辙,打算一路吃进去,听见我的脚步声,

静静抬起头,尖了尖耳朵。”初读这句,只读出了“我”与“马”的相遇,再读出了“我”与女人的相遇,三读却读出了车、马、人、城的剧烈相撞。我以为事先准备好的“令人不安”之心理准备落空了,此时才知道我的准备还是不足以迎接这样的相撞。

在马与草的天然关系面前,多了一道车辙。于是,草被改变了,马与草的关系竟同时被改变了,这令我心中骇然。再三重读,我依然无法言明这骇然之感的全部。想起梦也先生前几天一边走路一边谈画画,说:“大画家有时候一笔下去,你直接就害怕了!”我不懂画,所以认真看着他,记住了诗人的表情和这句随口说出的话。想来艺术是相通的,我确实被小说中的这段话吓到了。

《奔马图》的篇名自然是从古典意象中直接拿来,中学生小可被长久压抑的母爱缺失所鼓动,终于策马奔驰在这座现代城市。古典篇名和现代小说内容之间的贴合与背离,精准地揭示了一种真实的状态,关乎城与人、古与今的林林总总。“马转身时我全看了两只眼睛,右眼黑乌乌,像卧着一只黑鸟。我心跳怦怦,觉得同时被它的右眼所谛视。”借助瞎马的眼,我们短暂地摆脱了自己的盲视,用新的眼光谛视了周遭的世界,并吐出口片言语的感慨:人都被改变了,何况马;反过来说竟也成立,马都被改变了,何况人。这饶舌又言不尽意处,正需要一篇小说来上下周全。于是,《奔马图》来了。

■新作快评 夏立君中篇小说《在人间》,《大家》2021年第6期

冷热对视中的叩问

□高 军

夏立君一直主写散文,小说基本是偶尔为之,却似总能做到出手不凡。十余年前,他的小说《草民康熙》《天堂里的牛栏》等就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以散文集《时间的压力》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后,夏立君又重拾小说创作,近年来一些重要文学期刊连续推出其作品。

《在人间》(《大家》2021年第6期)这部4万字的中篇,由两个单元构成,颇富创意地分为“上阙·话说老王”与“下阙·老王说话”。

一只个头硕大的老鳖来到岸边晒壳,被吕县牛头岗水库管护员纪元发现,一连串匪夷所思之事陆续发生。只因老鳖整个头出奇地大,所有人便不约而同将其奉若神明。有打拱作揖的,有垂手而立默许愿的,有磕头的,有烧香的。老鳖经常向老鳖倾诉自己的心事,水库管理局副局长关心这只鳖在鳖族中的级别,副县长老鳖都拱手称它老领导,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一只老鳖面前尽情表演着。在放归现场,各人各说各话。老鳖永远沉默。而老鳖却听到了老鳖的怒吼:老鳖,去你妈的吧,滚回你的人间吧!老鳖跪地磕头,并以老鳖的走路姿势爬行开去,要追随老鳖而去。老鳖回到水中,老鳖被人拽住。

小说叙述手法独特。上阙以叙述者所知大于作品中人物所知的洞悉一切的全能视角,对情节及形象进行加工处理,在人物、动物和事件中自由切换,游刃有余。下阙转换叙事角度和角色,让老鳖

成为人间一看客,以鳖眼看人并开口说话,展开对整个过程的另一维度叙述,深化上阙的表达,完成现实与荒诞的融合。上下两阙的语言与腔调明显区分开来,各具魅力,又浑然一体,仿佛让读者从正反两面看到了立体的真相。两声部聚焦的叙事艺术特征,增加了作品的可信度丰满度完成度。摒弃连续叙述路径,采取断裂式对峙式叙述,形成一种相互勾连又彼此独立的调性组章,交织的讲述显出延绵的气势。小说结构是作者所永远迷恋的。探索的努力值得肯定。

正如小说“题记”所言:“冷血动物那么冷,热血动物这么热,中间是透明的万水千山。”在多重叙事声部相呼应的结构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生活的光怪陆离,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看到某些人物的不顾廉耻,看得仔细,看得透彻。同时也给读者带来很多启示,在冷与热的对视中,让我们不断思考,失去了什么。作者或许是以冷幽默式的反讽来表述:做一个超越铜臭的商人,做一个不忘初心的官员,做一个平等待人待众生、永远葆有一己尊严的普通人。

这篇作品时而平穩叙事,时而机锋突起,多有令人忍俊不禁之处。“宇宙间若有神,只能是那本来神的神去做神,而不是由本来不是神的,变成神或化妆成神。”“可是,在咱眼里,这狗的狗格也更卑贱多了。卑贱能力越强,竟然就越值钱。”诸如此类的句子俯拾皆是,迅捷锐利,不着痕迹,令人发指。

写一部中共一大的国民读本

□徐 剑